



貴州省从江县平正乡刚边寨 僮族社会经济調查資料

(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資料之十四)

内部参考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貴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編印
中国科学院貴州分院民族研究所

1964年5月

目 录

壹、概 述	(1)
貳、經 济	(3)
一、农業	(3)
(一) 生产力	(3)
1. 耕地与农作物	
2. 生产工具与设备	
3. 劳动力和劳动组织	
(1) 劳动力	
(2) 劳动组织	
4. 生产技术和经验	
(二) 生产关系	(7)
1. 土地占有情况	
2. 土地转让	
3. 农具、耕牛占有情况	
4. 林业及林木占有情况	
5. 地租、雇佣及其他剥削	
(1) 地租剥削	
(2) 雇佣剥削	
(3) 高利贷剥削	
(4) 农民的赋税负担	
二、手工业及农家副业	(16)
(一) 手工业	(16)
1. 木工	
2. 铁工	
3. 银匠	
4. 烧瓦	
5. 纺织、染色、成衣	
6. 竹器、草席、草鞋的编制	
7. 粮食加工	
8. 酿酒	
(二) 农家副业	(18)
1. 牧畜	

2.漁猎	
三、商品交换	(19)
叁、社会組織与人民的反抗斗争	(21)
一、家庭与社会組織	(21)
二、人民的反抗斗争	(22)
肆、生活习俗和文化教育	(24)
一、飲食	(24)
二、服飾	(24)
三、居住	(25)
四、婚姻	(25)
五、喪葬	(26)
六、节日	(27)
七、禁忌、迷信	(27)
八、文化教育	(28)

壹、概 述

貴州的僮族共有一万四千余人。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內的，据1956年統計，共一万三千五百五十九人，占貴州境內僮族人口的97%左右；其中又以从江县最多，計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三人，占全州境內僮族人口的85.83%，主要分布在下江、宰便两区。

平正僮族民族乡（解放前为平正乡）1956年成立，属从江县下江区，共轄六个行政村。据1958年統計，全乡人口六千三百六十四人，其中僮族四千五百六十一人，苗族一千〇三十七人，侗族四百七十七人，汉族二百六十四人，其他民族二十五人。

該乡計轄二百九十八个自然村寨，其中以平正（民族乡人委所在地）及其附近四寨和刚边等十一寨分布較为集中。刚边等寨主要是僮族居住，位于孖覽河“三百”段（該河計分三段），村与村相距不过三至五华里，平均每寨約三十戶。如散居高山深谷的村落，有的仅有三家，村与村相距一般为二十至三十华里。“大分散，小聚居”，是該乡民族分布的特点。

第五行政村是該乡僮族聚居的主要区域，計轄刚边、古矮、宰弄、宰牙、宰別、归眼等十一个自然村，共二百八十四戶，一千二百三十二人，其中僮族一百八十八戶，七百八十八人，占全村总人口的63.96%，侗族七十五戶，三百二十八人占全村总人口的26.62%；苗族二十一戶，一百一十六人，占全村总人口的9.42%。侗族聚居归眼，苗族分布刚边、宰牙，僮族除归眼以外分布于刚边等十个自然村。

刚边、古矮、宰弄、宰牙四寨（以下简称刚边四寨），是僮族人口比較集中的地区，在本行政村北部离平正（乡人委所在地）約二十华里。刚边、古矮、宰弄三个寨居于孖覽河（“三百”段）右岸小山丘上，房屋櫛比，成“品”字形，与宰牙隔河相望，村寨东面是大苗山主干，越过分水岭即广西大苗山苗族自治县境。孖覽河位于大苗山西麓，由南向北流至下江镇附近的腊鹅寨，与都柳江交汇，水浅滩多，只能行驶小型舢舨船来往于刚边、下江之間。陆路多为羊腸小道，山高谷深，道路崎岖，交通极不方便。

气候冬寒夏热。冬有霜雪，夏季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多水田；但河谷台地较少，梯田占绝大多数，均适宜种植水稻。水稻品种以糯禾、糯谷为主，少种粘谷。此外还有小米、紅薯、包谷等。秋收后，田土閑置不种小季作物。經濟作物有棉花、蓝靛、大豆等。林产有杉木、油茶、油桐等。

当地的僮族以从事农业为主，商品經濟不发达。解放前十年左右，农民买进必需商品或銷售土特产时，均須运到广西或下江、秀洞、宰便等地赶場（下江、秀洞、宰便等地与刚边四寨相距七十到七十五华里）；往后，板田寨虽然开了一个小場集，但赶場者寥寥无几，农民需要的农具等商品不能滿足。解放后，平正、板田各設供銷店，并于乡境内如刚边等寨設代銷店，供应商品及收购农副产品；这样即消灭了中間剥削，又便利了农民。

刚边四寨的僮族，虽然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都有其民族特点。但具体表现于衣、食、住方面的，却与从江县的侗族相接近，与附近宰便区秀洞乡孖点寨的僮族反而差别较多。据说，孖点的僮族是嘉庆末年（1820年）由广西南丹县迁来的，百余年来，他们仍与南丹僮族保持交往，因此在衣、食、住等方面均与之相近。而刚边四寨的僮族则迁来较早，又与广西僮族多年无往来，同时僮族和侗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原有相似之处，与侗族长期彼此交往，以至在各方面如服饰和风俗习惯逐渐接近。

传说平正乡所属部分地区原来是苗族居住，僮族是以后迁来的。解放前，宰船寨的僮族过“大年”时，要打糯米粑送给附近加六寨的苗族。据说，宰船寨的土地是加六寨苗族赠给僮族的，因此送礼表示感谢，以后就相沿成俗了。又如孖点寨脚的平坝田，其所有权不属于孖点寨和附近塘洞寨的僮族，而属于距孖点寨很远的苗族。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上述传说可信的。

但是僮族迁来平正乡的时间也是很久远了。据《嘉靖图经》载称：“僮家者，乃西山阳洞之土人，即广西溪洞僮蛮也。与苗人杂居，其俗，嫁、娶、葬大同小异；其语言、饮食、衣服与广西柳州夷同……；其所居屋因竹为阁，或放板为‘楼’人安其上……”。西山阳洞长官司置于元初（或谓置于宋），明因元制，辖有今平正乡等地区。《嘉靖图经》所指该司境内的僮家，即今归林、平正两乡的僮族；又说：“僮家……即广西溪洞僮蛮……”。由此可见平正乡的僮族在十六世纪中叶已由广西迁到平正乡了。

此外，从平正现存的一块石碑碑文中也可以推测该乡僮族迁来的年代。石碑是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竖的。碑文罗列各村寨头人姓名，其村寨名称包括现在平正乡所辖的主要寨子。从山区村寨一般发展情况来看，一个较大村寨的形成需时是较长的，如孖点寨，道光年间（1821—1850）才开始有人居住，直到现在（1959）还不到二十家。嘉庆七年（1802）以前，平正乡僮族聚居的主要村寨即已形成，《嘉靖图经》记载是可靠的。

据僮族的传说和诗歌叙述，现在僮族聚居或杂居的村寨，有的是从外地迁来之后繁衍分支出去的。如传说秀洞乡塘洞寨的僮族迁自刚边，因此该寨的青年妇女每年都要到刚边寨来“讨棉花”，“探老家”等。

平正乡僮族社会中出现贫富，发生阶级分化也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了。僮族古歌《比榜》叙述他们的祖先迁来以后，即出现“界奶”和“界能”两个富有者。“界能”用银子作礁窝，“界奶”用银子作猪槽、酒壶和秤锤等。嘉庆七年（1802）贵州兵备道在平正立的一块石碑，碑文中有“土地买卖，杂役均担”的规定，反映了当时土地买卖已经盛行。1840年以后，这里的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也逐步趋于尖锐；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已是僮族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和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了。解放后，经过伟大的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农业生产有了发展，初步改变了山区的贫穷落后面貌。现在，广大僮族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迈步前进。这个资料所反映的，是解放前平正乡僮族的社会历史情况。

貳、經濟

一、農業

(一) 生產力

1. 耕地与农作物

耕地分田、土两类：田又分水田与旱田；土有山地与园子地。田多是梯田。且由于村寨附近都是崇山峻岭，开成的梯田大小面积是极不一致的。当地有“栽秧不下田”和“脚盆田”、“斗笠田”等来形容田地形状的多样。土的数量少，但仍有大片荒坡有待于开垦和利用。据1957年調查統計：全乡荒山面积占总土地面积78%，耕地占11%，林地占8%，其它占3%。地勢比較平坦的刚边四寨，土地总面积为五千九百二十七亩，其中耕地仅有六百八十八亩，占总土地面积的11.61%，林地占13%，荒山占70%，其他占5.39%。

水田大多种糯禾或糯谷，旱田均种粘谷；山土种棉花及杂粮；宅旁园地种蔬菜。冬季田土均休閑，不种小季作物。山土中有实行休耕制的。荒地可以自由开垦；但垦后很少施肥（有的仅将地上杂草烧灰作肥料），收获两年便丢荒了。开荒費力多、收益少，只有无地或少地的貧雇农开垦少量种植杂粮，在經濟生活中作用微小。

土壤一般属于酸性，按当地的习惯分为小黑泥、黃泥、黃沙泥、烂泥、瘦泥、白泥、黑紅泥等种。

农作物分粮食作物和經濟作物两类。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包括粘稻、糯稻及糯禾）；其次有包谷、紅薯、木薯、小米等。水稻以糯禾及糯谷为主，产量約占90%。水稻品种有“嘎董”、“夺翁”、“裁崩”、“裁利”等十余种，其中以不易脱粒的糯禾为最多。粘谷产量約占稻谷产量的10%；只有两个品种。杂粮产量极微。經濟作物有棉花、蓝靛、花生、黃豆等。

2. 生产工具与设备

生产工具以鐵器为主，种类有鋤、犁、釘耙、刲刀、摘禾刀、镰刀等。此外还有用竹木制成的耙。

鋤是翻土的主要工具，鐵質木柄，分挖鋤、板鋤、薅鋤三种。挖鋤作挖旱田用，長八寸，寬約三寸，重約一点五斤。板鋤，挖水田用，長六寸許，寬五寸許，重約一斤。薅鋤作挖菜园或棉花地用，口寬約五寸，鋤背呈半圆形，用铁褲安置鋤柄，与鍤相似。

耙有四种：一种是木架竹齿（齿有八枚），高二点五尺，重約三斤，作凸字形，使用时用牛牵引，同时用力扶压，适用耕作面积較大的田；一般为手耙，形状与前者相

似，惟扶手改为长柄，柄与耙齿成直角，用以耙面积小的梯田；一种为薅秧耙，与手耙相似，惟体积較小，耙齿长四点五寸，柄亦短；一种为钉耙，铁质木柄，用铁钉装柄，三齿，掏肥用。

镰刀：半月形，割粘谷及牛草用。

摘禾刀：收获糯禾用，其构造是将一块锋利铁片镶在半月形的木片上，并于木片背部中央垂直装一小棍，系上绳环即成。使用时，将环套在右腕上，拇指握棍，木片置于中指与无名指之間，两指（中指和无名指）向內压，把禾秆切断。

割刀：形状象矛，割田埂用。

弯刀：砍柴或积綠肥用。

犁与“木牛”：犁鏟（当地称为犁头犁鑿）用生铁铸成，分两部分。下部称为犁头，长约五寸，上部称为鐸板，高约五寸，犁架为木质，体积較小，全部重量不上十斤。犁田时以人力牵引，謂之“拉木牛”。所謂“木牛”，是一根长約八尺的木棍于两端往里一尺处各鑽五寸許木楔，成直角形，两楔平行，前楔端系绳一条，绳的另一端系犁具。犁田时，牵引的人以肩向前抵木楔，一面以手牵引系于犁上的绳；后面一人也是以肩推后楔和掌握犁把前进。“拉木牛”的耕作效率，比鋤耕較高，但使用不普遍（如刚边四寨有犁还不到十架）。

耕牛：多半飼养黄牛，水牛极少。当地有“牛吃草，人吃饭，用牛犁田是懒汉”的說法，因此翻土用鋤挖或“拉木牛”，耙田时才用牛牵引。

谷桶：木质，五尺见方，收获粘谷或糯谷时作脱粒之用。

谷籮：篾质，呈椭圆形，籮口两旁有提耳，肩运时以提耳挂于扁担上。此种谷籮便于在陡坡間行走。

粪籃：篾质，圆形，籃口有两个提耳，挑运时与谷籮同。

禾晾：一般建在靠近道路的田边，形如亭閣，四周亭柱均装横木，禾把晾于横木上，晾干后收貯入仓。

谷仓：储藏禾、谷用，一間到三間不等；一般是建在路边，与住宅分离，以防火灾；也有与住宅連接的。

此外，还有加工粮食的踏碓、水碓、水碾等。

以上各种生产工具的铁质部分，有的是从下江、宰便或广西弯洞买来的，有的是自购原料，請本寨铁匠加工的（无论僮族、汉族或苗族工人打制，形式都是一样）。木质器具一般都能自己制作。竹器除精細者須要购买外，也都能自己編制。

3. 劳动力和劳动组织

(1) 劳动力

第五行政村（刚边四寨）各阶级阶层劳动力所占比重，据1952年土地改革时统计如下表：

阶 級 構 成	戶 數	人 口	主 要 勞 動 力				輔 助 勞 動 力			勞 動 力 合 計	備 考
			男	女	合 計	占人 口 本 階 級 的 % 數	占勞 動 主 力 總 勞 數 的 % 數	男	女	合 計	
地 主	13	60	4	7	11	18	1.94	9	9	18	29
半地主 式富农	1	9	1	1	2	22	0.35		1	1	3
富 农	13	63	11	11	22	35	3.88	6	8	14	36
小土地 經 营	1	3		1	1	33	0.18	1		1	2
富裕中农	10	50	12	14	26	50	4.59	7	3	10	36
中 农	65	267	73	71	144	54	25.44	26	32	58	202
佃中农	1	4	1	2	3	75	0.53		1	1	4
贫 农	118	533	148	71	219	41.09	38.71	48	50	97	317
雇 农	61	242	81	57	138	57	24.38	25	13	38	176
贫 民	1	1							1	1	1
合 計	284	1,232	331	235	566	46	100	122	118	240	806

該村的主要劳动力占总人口46%，輔助劳动力占19.47%；无劳动力（包括丧失劳动能力）及有劳动力而不参加劳动者占34.53%。从各阶级主要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来看，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仅占6.35%；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和佃中农）占30.56%；贫农占38.71%；雇农占24.38%。由此可見地主、富农的劳动力是极其次要的。

第五行政村的主要劳动力五百六十六人，耕种土地一千三百二十点零三五亩（該村占有总耕地面积为一千三百七十三点零五亩，其中有五十二点七亩在外村出租），平均每个主要劳动力负担二点三三亩；如果加上輔助劳动力二百四十八人，则每人平均仅负担一点六四亩。同时，每年栽秧、收获时，居住高山的苗族农民还成批下来給地主、富农帮工，这样，該村的劳动力有更多剩余了。因此，該村每年都有一部分贫雇农到邻县或广西去出卖劳动力。

第五行政村的壮健男子，只能肩负五十到七十斤，同时，上午出工迟，下午收工早，每天的劳动时间一般是六至八小时左右，劳动力的虚耗比較突出。

男女之間仅有某些习惯上的分工，但并不严格。男子主要从事农业劳动，从播种到收获，除扯秧之外，其余工序都参加。女子除参加农业劳动（惟耙田、拉木牛、补田塍不参加）之外，种棉花、紡紗、织布以及担水、喂猪、舂米、煮饭等家务劳动一般是她们负担。老年和少年担负輕微的輔助劳动：如割草、看牛等。

社会分工不够发展，沒有独立的手工业。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

(2) 劳 动 组 织

当地僮族的劳动组织以个体家庭为基本单位。此外，还有“帮工”、“换工”的互

助习惯，但均属于临时组合，劳动力的安排仍由“主家”负责。

“帮工”是自愿的义务互助，一般是亲帮亲、邻帮邻，以自然村寨为限，不还工，不付工资。帮工的范围，包括农业生产（栽秧、打谷、折禾）、婚姻、丧葬以及造房屋等。当某家有上列事件需要人们帮工时，即于寨内传呼（当地叫做“喊寨”）；亲族、邻里凭自己的意愿前往帮工（不去的也不勉强），主家备酒肉饭食款待（上午便餐，下午吃酒肉），事竣即各自回家。这个传统的互助习惯，后来被地主阶级利用作为大量剥削农民劳动的一种手段。

换工也是当地的一种互助习惯，但换工是需要还工的。开始还没有计较等价交换；无论体力强弱、技术高低，都可以一人换一人、一天换一天。例如某人家里急需请铁匠制造农具，又值铁匠正在作普通劳动时，即以一般劳动力换取铁匠的手工业劳动，按时间计算还工。换工一般是由主家待饭，但还工时，如果对方因粮食缺乏，不待饭也不计较。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还工时可以多还或少还。但是刚边四寨到了贫富日愈向两极分化时，雇佣关系随之发展，而换工的情况也有所改变。这时，原则上虽然还是一工换一工，而手工业劳动则须按照技术工作计算了。

此外，当地还有以“活路头”掌握农事季节的传统习惯。“活路头”是世袭的。每年春耕时，先由“活路头”举行“破土”仪式之后，各户才能动手挖田（或犁）。播种、插秧也要由“活路头”破土。据说，如果不遵守这一习俗，当年的庄稼就会长得不好。

4. 生产技术和经验

刚边四寨的农业生产技术是比较落后的。耕田翻土大半是用锄挖，一个主要劳动力每天只能挖水田四分或旱田二分半。“拉木牛”，两人一天犁旱田八分，效力比锄挖高，但深度不过四至五寸。耕牛只用来牵引耙田，一人一牛每天可耙田一亩。当地的稻田一般都是挖一次（或犁）耙一次或两次。

水稻（包括糯禾、糯谷、粘谷）均育苗移植。糯禾种子穗选、糯谷及粘谷块选，每亩播种三斤。水稻移植前，一般都施底肥；移植后，中耕除草时加施追肥。底肥用秧青和厩肥，追肥则均用厩肥，每亩约施厩肥六百斤（当地不用人粪作肥料）。酸性土壤则将田里的稻草烧灰作肥料。中耕施肥一般是一薅一追。但贫农因生活贫困，距离村寨较远的高坡田顾不上中耕除草，有的甚至栽“白水秧”（即不施肥）。

粘谷及糯谷用镰刀收割，以谷桶脱粒，每人每天能收获二百斤；糯禾是用摘禾刀一穗一穗的连禾秆摘下，一个劳动力每天只能收割一把半（约重七十五斤），效率较低。

据一般经验，种植水稻自播种到收获整个生产过程，每亩（1952年土地改革时，当地是以实际产量进行分配。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是以五百斤产量定为一亩。以下均同。）田约需工三十个，其生产环节及各个工序所需耕作时间如下表：

工 种	一个劳动日的功效 (亩)	每亩所需劳动日数 (个)	备 注
挖 田	0.4	2.5	
耙 田	1.0	2	按两道計算
挑 底 肥	0.5	2	
挑 追 肥	1	1	
栽秧	0.5	2	
薅秧	0.5	4	按两道計算
割田埂	0.25	4	
糊田坎	0.4	2.5	
摘 禾	0.15	7	
割 谷	0.4	2.5	粘谷产量約占十分之一。

合計每亩需工二十二点五个到二十七个（按：禾为摘收，谷为割收。），再加上放水田、防虫害零星工作以及修水利等集体劳动，平均每亩需工三十个左右。

刚边四寨虽有孖覽河及几条山溪流經其間，但因田高河低，受益不大。由于，当地的农田多半是引常流的山泉灌溉，沟渠纵横交错，大小数十条，基本上解决了农田用水。

旱、虫灾等自然灾害，在刚边四寨也时有发生；但是人們認為是“天降之灾”，不去积极防治，而以“祈祷”等方式跪在田边“喊天”“許愿”。此外，还有野猪、老鼠、麻雀等鳥兽灾害。由于当地有打猎及罗捕雀鼠的习惯，防止是比较积极的。捕猎工具有弓弩、鳥枪、老虎箇、雀笼、竹夹、竹板、土打板、雀套等，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鳥兽灾害。

水稻种植的时间安排，一般是二月挖田，三月播种，四、五月栽秧，六月薅秧，七月下旬收粘谷，八、九、十月收糯禾。

生产禁忌很多，如：

忌雷：以每年第一次打春雷的日子及下一日忌下稻田，每旬忌两日，到插秧为止。

忌戌：栽秧以后每逢戌日不能下田工作。第一个月逢戌忌两天（戌日及前一天），以后只忌戌日，直忌到禾谷抽穗为止。

立夏日忌用牛耙田。

“龙脉”上不能开沟渠。

此外，还有所謂“寡妇田”、“老虎田”（老虎睡过滚过的田），“雷打田”（被雷击过的田）等，都不能耕种（須請“鬼师”祈祷后方能耕种，否則抛荒）。

（二）生产关系

1. 土地占有情况

第五行政村的土地，除村寨公有的荒山及风水林地外，全部耕地都为私人占有。据

1952年土地改革时统计，该村各阶级、阶层占有土地情况如下表：

从江县平正乡第五行政村（刚边四寨）土地改革前各阶级占有土地统计表
1952年

阶级构成	户数	人口			土地占有(亩)							
		男	女	合计	自耕		出租		合计	占总数的%	每人平均占有	
		田	土	田	土	田	土	田				
地主	13	32	28	60	4.87	111.46	3.84	144.74		260.04	18.94	4.33
半地主式富农	1	2	7	9	0.73	8.58	0.48	13.05	0.10	22.21	1.62	2.47
富农	13	31	32	63	5.11	116.27	2.80	41.43		160.50	11.69	2.55
小土地出租者	1	1	2	3	0.24	7.10	0.19	3.75		11.04	0.80	3.67
富裕中农	10	24	26	50	4.06	83.82	2.17	11.97		97.96	7.13	1.96
中农	65	125	142	267	21.67	359.56	11.64	16.08		387.28	28.21	1.45
佃中农	1	1	3	4	0.33	0.52				0.52	0.04	0.13
贫农	118	273	260	533	43.26	337.33	20.16	2.64		360.13	26.23	0.66
雇农	61	135	107	242	19.64	65.77	7.60			73.37	5.34	0.31
贫民	1		1	1	0.09							
合计	284	624	608	1,232	100	1,090.41	48.88	233.66	0.10	1,373.05	100	1.11

注：* 土地面积计算单位为亩。按当地习惯常年产量500斤折合一亩计算。

* 地主出租土地144.74亩中，包括有出租在外（行政）村的52.7亩。

第五行政村的地主、富农和小土地出租者，占有土地四百五十三点七九亩，为全村总耕地面积的33.05%；中农（包括富裕中农、佃中农）占有土地四百八十五点七六亩，为总耕地面积的35.38%；贫雇农占有土地四百三十三点五亩，为总耕地面积的31.57%。地主阶级平均每人占有土地四点三三亩为雇农平均每人占有土地零点三一亩的十四倍弱，阶级分化、贫富悬殊已十分显著。

僮族聚居的刚边四寨，土地比较集中，八户地主共占有总耕地面积的24.50%，每人平均五点零五亩；五户富农占有总耕地面积的12.50%，平均每人二点六二亩；两者合计为总耕地面积的37%，比全村的比例高3.95%。此外，按人口平均占有土地最多的：如古矮寨地主韦文甫一户，平均每人占有十一点零七亩，为全村地主阶级每人平均数的二点五倍强。按户占有土地最多的：如古矮寨地主韦冠童（一户分作三户）计七十一亩一五亩；刚边寨韦德光（也是一户分作三户）计六十九点二七亩。两户合计共一百四十点四二亩，为全村地主阶级占有耕地总数的54%。

韦冠童和韦德光都在土地改革前后死去，在世七十多岁。他们都是在自己手上从小康之家发展为地主的；其剥削方法是以饲养牲畜卖现金放高利贷，日积月累首先兼并了“四寨首户”韦老雍家的七百把田（合七十亩），之后（在军阀统治时期），利用军阀对农民勒索的机会，又兼并了不少土地。他们从1921年开始，就成为当地的首户，到

1952年土地改革时为止，过地主生活約三十余年。

韦老雍比韦冠童长四十多岁，生于1840年左右。青年时以出卖一林杉木的价款放债买田，至晚年有田七百把（折合七十亩），是当时最大的地主（后来分散給五个儿子）。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因被拉兵敲詐破产，土地先后为韦冠童、韦德光兼并。韦老雍的孙子輩在土地改革时除一戶是中农外，其余都是貧农。

第五行政村的十一个自然村寨中，包括有僮、侗、苗三个民族。各族占有土地情况如下表：

类 别	僮 族						侗 族						苗 族					
	户 数		人 口		占有土地情况		户 数		人 口		占有土地情况		户 数		人 口		占有土地情况	
	数量	每户平均	数量	每户平均	数量	每户平均	数量	每户平均	数量	每户平均	数量	每户平均	数量	每户平均	数量	每户平均	数量	每户平均
地 主	13	60	260.04	20.00	4.33	—	—	—	—	—	—	—	—	—	—	—	—	—
半地主 式富农	—	—	—	—	—	1	9	22.21	22.21	2.47	—	—	—	—	—	—	—	—
富 农	12	61	152.41	12.70	2.50	1	2	8.09	8.09	4.05	—	—	—	—	—	—	—	—
小土地 出租者	1	3	11.04	11.04	3.67	—	—	—	—	—	—	—	—	—	—	—	—	—
富 裕 中 农	7	34	72.61	10.37	2.14	3	16	25.35	8.45	1.58	—	—	—	—	—	—	—	—
中 农	49	200	303.87	6.20	1.52	16	67	83.41	5.21	1.25	—	—	—	—	—	—	—	—
佃中农	—	—	—	—	—	1	4	0.52	0.52	0.13	—	—	—	—	—	—	—	—
贫 农	78	330	247.71	3.18	0.75	30	145	78.83	2.63	0.54	10	58	33.59	3.34	0.58	—	—	—
雇 农	27	99	38.47	1.43	0.39	23	85	17.81	0.77	0.21	11	58	17.09	1.55	0.29	—	—	—
贫 民	1	1	—	—	—	—	—	—	—	—	—	—	—	—	—	—	—	—
合 计	188	788	1,086.15	5.78	1.38	75	328	236.22	2.16	0.72	21	116	50.68	2.41	0.44	—	—	—

第五行政村各民族占有土地情况也是很悬殊的，該村总人口一千二百三十二人，占有耕地一千三百七十三点零五亩，每人平均一点一亩。其中僮族七百八十八人，占总人口 63.96%，占有全村耕地 79.10%，每人平均一点三八亩，比总平均数高零点二七亩。侗族三百二十八人，占总人口的 26.62%，占有全村耕地 17.20%，每人平均零点七二亩，比总平均数低零点三九亩。苗族一百一十六人，占总人口 9.42%，占有全村耕地 3.70%，每人平均零点四四亩，比总平均数低零点六七亩。苗族到这里安家落户，至今（1959年）仅四代人，他們的生活主要是帮工及佃耕僮族地主、富农的土地，自己占有的土地数量极微。

第五行政村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是僮、侗两族的地富阶级；其中以僮族（地主、富农）尤为突出。僮族的地主、富农二十五户，一百二十一人，占有土地四百一十二点四五亩，为全行政村总耕地面积的 30.04%，为本民族占有总耕地的 37.99%；平均每户十六点五亩，平均每人三点四一亩。僮族地富阶级每户平均占有的土地，为全村一百四十三户中农（包括富裕中农、佃中农下同。）每户平均三点四亩的四点八五倍；

为本民族五十六户中农每户平均六点七二亩的二点四六倍，为全村一百七十九户貧雇农每户平均二点四二亩的六点八三倍，为本民族一百零五户貧雇农平均每户二点七三亩的六点零四倍。

从人口平均占有量来看，第五行政村僮族地富阶级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为全村中农阶层三百二十一人每人平均一点五一亩的二点二六倍，为本民族中农阶层二百三十四人每人平均一点六一亩的二点一二倍；为全村貧雇农七百七十一人每人平均零点五六亩的六点二七倍，为本民族貧雇农四百二十九人每人平均零点六八亩的五倍。

2. 土 地 转 让

平正乡僮族发生土地买卖的开始年代无从稽考，但是，从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贵东兵备道立在平正的一块石碑载有“土地买卖，杂役均担”的规定来看，可知在十八世纪末，当地土地买卖已经盛行了。而土地的大量兼并，还是在军阀混战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1912—1949）。卖田的主要原因，有由于欠债、土匪抢劫、国民党拉兵及其他苛捐杂税、乡保长勒索和婚姻、丧葬等引起。

买卖田地要写契约，并请房族乡党作中人，抽取卖价的10%作为对中人的报酬。出卖地时，房族近亲有优先承买权；本房族无人承买，才能卖给外人。抗日战争时期，上等田每把卖银毫（广东造的银币）六十毫，十把折合一亩，计六百毫；中等田五百毫；下等田三百毫。1945年由于粮食价涨，田价也随之上升，当时上等田每亩卖价为二千毫（但实际上只合三百斤大米）。但是地主只选好田买，次田卖不出去。农民遭到飞灾横祸（如拉兵等）急需用钱时，只好以较多的次田换取较少的好田出卖，或伙卖伙种。例如甲急需卖田而地主却看中乙的田，则甲向乙商量，伙卖乙的田十把，甲乙平分，然后伙种甲的田十把，收成平分，田亦为两人共有。

典当田地的手续一般与买卖同；但典当可以取赎，期限有的是约定若干年，有的是每年春耕前都可以取赎。取赎时照原典当价格。在出典者无力赎回而不得不卖时，承典人有优先承买权。

抵押是债务人将土地抵押给债权人，由债权人收租作债权。有实抵倒租和由债权人另行招租两种形式。实抵倒租：如韦玉新因新兵派款借了银毫七百毫，用田一点三五亩作抵押，仍由自己耕种，每年倒租行息谷三百五十斤。另行招租：如韦金木以田九分向地主韦文輝抵得银毫三百毫，由债主另行招租抵利。过期不赎，该田即算“抵死”，为债权人所有。

遗产继承是在家族内部按父系进行的。当地有除“长子田”的习惯，即是将遗产先除一部分给长子，然后均分（长子仍得一分）。析分遗产时须请凭亲族书立“分关”。无子继承的绝产，由房族近亲均分承继。无子有女招养赘婿时，须将一部分产业送给本房族近亲余者由赘婿承继。男子出赘也要把自己继承的产业留下一部分给其近亲；余者带到女家入赘。女儿虽然没有财产继承权，但是地富阶级的女儿出嫁也有给她一部土地带到夫家的。当地叫做“姑娘田”。“姑娘田”不能转让或出卖，女儿死后，田即归还娘家。

刚边四寨僮族嫁“姑娘田”的不普遍，只有韦善保、韦玉新、韦美名三家。据说，韦善保等嫁“姑娘田”的动机，主要是因为婿家贫穷，恐怕自己的女儿没有饭吃。

寡妇再嫁，不能把亡夫遗产带到新夫家，只能带走她的衣服、首饰。

3. 农具、耕牛占有情况

据1952年土地改革时统计，第五行政村各阶级、阶层占有农具、耕牛情况如下表：

阶 层	户 数	牛			耙			耕种土地 (亩)	备 注
		数目	%	按户 平均	数目	%	按户 平均		
地 主	13	26½	9.1	2	21	9.8	1.6	115.30	
富 农	15	21	7.4	1.4	18	8.5	1.2	135.42	包括半地主式富农及小土地经营各一户。
富裕中农	10	16½	5.8	1.6	15	7	1.5	85.99	
中 农	66	87	30.7	1.3	59	27.4	0.9	393.44	包括佃中农1户。
贫 农	118	108	38	0.9	82	38	0.79	449.53	
雇 农	61	25½	9	0.4	20	9.3	0.3	140.67	
合 计	283	284½	100	1	215	100	0.8	1,320.35	贫民1户未计入。

4. 林业及林木占有情况

林业以杉木、油茶、油桐的经济价值最高，但数量较小。据1952年年底土地改革时统计，第五行政村共有成林杉木一千八百九十九根；其中侗族占有九百一十二根，平均每人二点八七根；僮族占有九百五十七根，平均每人一点二一根；苗族占有三十根，平均每人零点二六根。占有最多的一户是侗族半地主式富农，共有二百根。杉木主要是自用，也有少数在本地出售。据1957年调查，油茶和油桐在刚边农业合作社共有二十二亩，平均每户不到两分地，而青杠树则有七百零六亩，为当地的主要林木。此外，还有供柴薪用的杂木二十亩。

5. 地租、雇佣及其他剥削

(1) 地 租 剥 削

地租是封建经济的主要剥削形式。据1952年土地改革时统计，第五行政村的租佃关系如下表：

类 别	占 有 土 地 总 数 (亩)	自 耕		出 租			佃 耕	
		数 量 (亩)	占本阶层 占有土地 %	数 量 (亩)	占本阶层 占有土地 %	占出租 总数 %	数 量 (亩)	占佃耕 总数 %
地 主	260.04	115.30	44.34	144.74	55.64	61.95	—	—
半地主式富农	22.21	9.06	40.79	13.15	59.21	5.59	—	—
富 农	160.50	119.07	74.19	41.43	25.81	17.73	—	—
小土地出租者	11.04	7.29	66	3.75	34	1.60	—	—
富 裕 中 农	97.96	85.99	87.79	11.97	12.21	5.12	—	—
中 农	387.28	371.20	95.85	16.08	4.15	6.88	20.62	11.39
佃 中 农	0.52	0.52	100	—	—	—	1.10	0.61
贫 农	360.13	357.49	99.27	2.64	0.73	1.13	92.04	50.83
雇 农	73.37	73.37	100	—	—	—	67.30	37.17
合 计	1,373.05	1,139.29	—	233.76	—	100	181.06	100

第五行政村耕地总数为一千三百七十三点零五亩，出租二百三十三点七六亩，为全村耕地的 17.02%；其中地主、半地主式富农和富农出租的土地共一百九十九点三二亩，占总出租数 85.27%；而地主阶级出租的土地所占比重，则为总出租数的 61.95%。

贫农也有个别出租少量土地的，但是他们同时又租入较多的土地。原因是，他们自己的少量土地距离本村远，生产不方便，不能不佃给他人，从而租入附近的土地耕种，以便照料庄稼，节约劳力。这种租佃关系，是属于交换耕种性质的。

第五行政村的耕地，出租到外村（行政村）的为五十二亩，占全村出租总数 23%，为全村占有耕地总面积的 3.83%；全村耕地出租数比租入数大 29.10%。

刚边四寨的地富经济极为突出，该四寨的土地出租数量，占（刚边四寨）总耕地面积的 23%，比全行政村出租比重高达 5.98%；其中，地主、富农出租的土地占（刚边四寨）出租总数的 90.73%，比第五行政村其余七个村寨地富阶级出租总数高达 5.46%（第五行政村其余七个自然村寨的地富出租土地数，为该七寨总出租数的 85.27%）。

刚边四寨的富裕中农也出租少量土地。中农多半是不租不佃，或少租少佃，也有又租又佃的。合计该四寨的中农阶层出租土地的数量，仅占（刚边四寨）出租总数 9.27%。贫农和雇农一般都是佃耕，只有两户（贫农）不租佃土地。

从民族来看，第五行政村出租土地者以僮族最多（主要是地富），占全村出租数的 90.13%，侗族占 9.87%，苗族则只有佃入。

第五行政村租佃土地的人家占全村总户数 58%。租佃关系分散复杂：一户地主有三十多家佃户；而一户农民又佃耕数户到十数户田主的土地。这些情况都反映了本区经济发展的特点。

第五行政村一般都实行活租制，无固定租额。租谷对半分，均交纳实物。秋收时，地主（或请人）临场监收，当面分租（也有经地主同意，佃户自行收获分租的）；租谷

由佃戶送到地主家里。地主临田监收时，佃戶还須宰鷄、鴨款待。种子由佃戶負擔“田賦由地主繳納。也有先留种子或先除田賦然后平分的。一般是附近村寨的肥田先除田賦（租額高于50%）；距离村寨远的山坡田則先留种子（租額低于50%）。

第五行政村由于耕作技术低下，粮食产量不高，农民所得的本来就很少，同时，地主以活租方式收租，迫使农民不得不在恶劣的条件下遭受剥削。在小农經濟脆弱的情况下，产量是不稳定的，地主就以活租制来剥削农民。可是地富阶级是要求能收租的，因而他們选择佃戶，以劳力强弱及有无耕牛为前提；劳力弱或者沒有耕牛的农民，就很难找到田种。且，如果非自然灾害的减产，影响地租收入时，地主、富农就要把田夺回，另行招佃。

租佃关系的建立，一般是口头定約（不立契約）。农民佃耕地主、富农的土地后，每年届插秧后、收获前，地主、富农“喊寨”时，佃戶必須前往服无偿劳役（其他时候“喊寨”可以不去）；有时还要去帮他們打柴、舂米、挑水。

（2）雇 佣 刺 削

第五行政村的雇佣形式，有长工（年工）、月工、日工三种，此外还有童工。該村的雇佣剥削以刚边四寨最突出，据1952年土地改革时統計如下表：

阶 层	户 数	雇 工					佣 工					备 考
		长 工		月 工		日 工	长 工		月 工		日 工	
		户数	工数	户数	工数	户数	户数	工数	户数	工数	户数	
地 主	8	4	5	1	4	8	2,940					
富 农	7	2	2	1	6	7	444					
富裕中农	5					5	150					
中 农	33					10	370				1	30
贫 农	56					3	23			1	1	35
雇 农	12							2	2	1	6	12
合 计	121	6	7	2	10	33	3,927	2	2	2	7	48
												3,649

刚边四寨的地富阶级共十五户，其中雇长工者六户，占40%；雇月工者二户，占13.33%；雇日工的则为百分之百。雇工数量，除长工、月工都是地富阶级雇佣外，他們每年雇佣的日工占該四寨全年雇佣日工总数的86.18%。雇工最多的为地主韦冠童，他除了每年雇长工一个之外，还雇佣日工六百天。

中农（包括富裕中农）雇工的户数占本阶层（户）的38.48%，都是雇佣日工。雇工数量为該四寨雇佣日工总数的13.24%。其中也有极个别户帮日工的。

贫农也有极个别户雇日工的，但为数极少，仅占該四寨雇佣日工总数的0.58%；同时，他們是在农忙季节忙不过来时雇佣极少数人帮助，自己的农事搞完后，又去帮他人做日工。

刚边四寨佣工的，以雇农为最多，佣工户数：帮长工者占雇农总户的16.67%，帮

月工者8.33%；帮日工的则为百分之百，平均每户帮日工六十五点八三天。其中佣工（日工）数量最多者，如贺荣新等每年都在三百天以上。

贫农帮月工的占本阶层总户1.68%，帮日工的53.65%，平均每户（全年）帮工三十二点六五天，其中帮工最多的，如市玉为一百四十天，韦老胞一百二十天。

刚边四寨的地富阶级，以雇佣日工最为突出，雇月工的最少。原因是，雇月工的工资较高，同时雨天不能干活；农闲时佣工者创造的财富为数比农忙时低。同时，雇日工在农忙时才给工资，农闲时除修理田塍之外，仅供饭食，因此雇者极多。

帮长工的以苗族贫雇农最多，其中有的是单身汉；有的是生活困难而家中尚有劳动力维持家务的。地富阶级雇佣长工，多半喜欢找单身汉，因为他们没有家，可以长期供他使用，同时还可以使用种种手段进行欺骗，不给工资。如苗族黄老四，自幼在地主韦云辉家当童工，长大后又当长工数十年。地主除供饭食外，每年只给两套衣服，不给工资。韦云辉欺骗他说：“我给你十二把禾田（一点二亩），人在我家时田也留在我家。可是这十二把禾田的收益，黄老四从未享受分毫。这种终身为地主服劳役而又不得报酬的长工，实际上等于卖身，而且连卖身钱也没有得到。”

当地一般雇佣长工均须订立合同，按合同付给工资。工资每年二百至二百五十毫。雇工的工作以农业劳动为主，农隙及下雨时则作家务劳动，或砍柴割草。全年只在过年时休息两天。有时还要遭受地主的打罵。

雇月工多在农忙季节，每月工资四十到五十毫，期满双方重议。

雇日工有开工资及不开工资两种情况：农忙时凡摘禾、“拉木牛”、挖田、耙田、挑粪、挑柴、栽秧等农事劳动，不分男女每天均给工资米四筒（合二市斤），或银毫二毫。不吃饭者则挑柴或割草一担给银一毫；薅秧一天给米一斤半，这种雇工剥削是极其残酷的。

刚边四寨在荒月替地富阶级服无偿劳役的，除当地贫雇农之外，还有居住高坡的苗族贫苦农民。五荒六月时，他们为生活所迫，纷纷下山找工作，有时达到五、六十人。刚边地主韦德光、古矮地主韦冠童便大量使用这些无偿劳力替他干活（有时每年长达两三个月）。

此外，刚边四寨的僮族贫雇农有的还到榕江或广西去卖零工或帮木商放运杉木，平均每年约三十多人。他们在外省卖工的时间至少两个月，有的长达半年。

“喊寨”，以刚边地主韦文辉、古矮地主韦冠童喊的最多，他们每年在挖田、栽秧、薅秧、摘禾时都要喊一次，其他地主如韦德福等每年喊两次（栽秧、摘禾）。地主、富农“喊寨”时，有空的农民都得去帮他；佃耕地富土地的农民甚至要将自己的农事搁下。农民说：“财主田多，粮食多，他‘喊寨’不去帮他，以后缺少粮食，他不仅不借给你，还要挨他的罵哩。”

（3）高利贷剥削

高利贷也是地富阶级对农民进行剥削手段之一。借贷以银毫为主，也有借粮食的，但均以粮食计息。计息的标准，一般是农历四月借出，八、九月本利还清，每百毫谷息谷八十到二百五十斤（谷价极低时利息达到最高额）；每百斤谷息五十到六十斤。过期不还，债主即勒令债务人将利作本，加算复利。

借贷时，一般要凭中人并书立契约，以田地或房屋抵押，没有抵押品者则须找人担保。